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化强国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中高度重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当前，大众学术蓬勃兴起，其健康发展对学术繁荣乃至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围绕推动大众学术健康有序发展，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推动大众学术健康有序发展

构建协同共创开放共享的知识创新生态

□ 吴亚女 秦 露

近年来，考古、法学、历史、国际政治等领域出现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不同年龄、资历、学科背景乃至国别的作者就某一个专业问题进行学术争鸣，让本来小众的学术讨论成为大众热议的文化事件，大众学术开始兴起并进入公众视野。何谓“大众学术”？该现象具有怎样的发展基础与趋势？如何发挥大众学术的积极作用，创造适应时代发展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新生态？这些问题都是大众学术发展进程中有待回答的问题。

何谓大众学术？大众学术，指的是数字化条件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促进专业知识通俗化传播与学理性问题大众化讨论，从而形成的新型文化形态。多元主体既包括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专业研究的学院派，也包含来自各行各业、掌握相关知识技能的非学院派，二者主要表现为互联网平台上的各类知识内容创作者。学理性问题指的是需要借助概念辨析、材料考证、逻辑论证以及相关检验等来处理的问题。文化形态表明该现象并非零散内容，而是在平台机制、社群互动和公共讨论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知识实践结果。

大众学术包含“大众”和“学术”两部分，首先区别于专业学术。专业学术指的是建制化的知识实践，主要体现为专业研究者的学术研究与生产活动，多发生在人数有限的共同体、固定的时间地点，如不同学会的学术会议、期刊的定期出版。相比起来，大众学术的主体并不局限于专家学者，也涵盖大量非专业的有知识者；活动场所从相对有限的线下扩展到了更加广泛的线上，如微信、抖音、B站、小宇宙等平台；表达形式更加多样，有图文综合文章，也有视频和播客等。

大众学术也区别于传统的学术大众化。后者一般指的是专家学者通过专业机构和文化机构，如学校、出版社、大众媒体等，进行专业知识的大众化、通俗化传播，除了各种各样的学术通俗读物外，也包括《百家讲坛》这样的电视节目。在互联网兴起后，知识传播经历了信息门户、知识付费等阶段，但仍具有较高的制度门槛，传播者仍多为专业学者，而大多数人处于接受者、学习者和有限反馈者的位置。与之不同，大众学术超出了传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结构，即由相对有限的知识主体经由权威中介向大众传递知识，发展为更加多元的主体参与到知识实践活动中，并通过互联网更加广泛地传播给更多的受众。

“大众”除了指主体多元与受众广泛外，也指所探讨问题的大众化特征。以往的学术大众化多是把已有理论和学术成果转译为大众能够理解的通俗版本。而大众学术关注的很多问题，并非来自学科内部，而是来自社会争议、历史记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认同等具体事件与问题，进而要求给出理论层面的回答。2025年以来，考古领域“昆仑石刻”发现真伪引发舆论热议，各路专家学者就此展开学术争鸣；法学领域围绕“治安违法记录封存条例是否应包括吸毒记录”引发了专业学者、从业律师和公众的讨论，以及由“斩杀线”全民讨论引发的学术回应，都是当前大众学术的不同程度、不同侧面的生动体现。

大众学术的发展基础与趋势。大众学术何以在当前兴起和发展？技术是关键因素。数字化生存正在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人们的知识实践与学习活动，也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平台展开。不过，国家顶层设计与平台转型、教育普及以及大众需求同样必不可少，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大众学术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指出：“提升科学素质，对于公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正是在现代化强国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政治实践，以及鼓励全民学习和提升科学素养的背景下，各个平台也纷纷进行内容转型，扶持知识类创作者。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也带动了人文社科知识的普及。

大众学术的兴起也离不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量受过专业训练但不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职业研究的人是本轮大众学术浪潮的中坚力量。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亿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2010年的8930人提高到15467人。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入各行各业，通过互联网将原本用于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形成了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知识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终身学习，学习需求也从一般常识扩展到专业技能、理论解释、科技前沿和公共议题等方面。

随着互联网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发展，大众学术的参与门槛持续降低、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其技术条件、组织方式、竞争逻辑、主体关系更加复杂，大众学术也呈现出多个重要发展趋势。

一是知识生产由数字化、网络化转向智能化。对大量知识生产者而言，过去主要依靠互联网来降低知识生产和传播门槛，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他们广泛地将人工智能运用到资料整理、文本生成等多个环节，人机协同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智能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内容通胀、观点同质化、虚假信源等新问题。

二是知识组织由平台化传播向平台化组织发展。大众学术之所以是“大众”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平台为多元主体的知识实践提供了条件。平台不仅越来越重要，其承担的功能角色也从知识的传播渠道进一步转变为知识的生态组织者。平台的算法推荐、搜索排序、商业激励等都影响着创作者的创作倾向。平台化组织能够为协同研究、公共讨论提供良好生态，但也可能造成大众学术的碎片化、娱乐化和伪权威化。

三是知识竞争由流量驱动向质量驱动深化。大众学术越发展，就越会面对知识供给增长与公众注意力稀缺的矛盾。一般性知识内容不再稀缺，而单纯依赖强冲突观点、情绪化表达和短平快结论，可能获得短期流量，却难以转化为持久信任、专业声誉和长期流量。知识内容的质量维度日益凸显，生动、活泼但又兼具专业性、原创性和现实性的内容会更容易获得大流量。

四是知识生产主体关系在分化中重构。大众学术的发展，使非专业研究者、行业实践者和知识爱好者由知识的接受者逐渐成为提出问题、生产知识以及参与论争的实践者。不同知识主体实际上具有互补性，但也可能相互区隔开，引发以大众经验否定专业研究、以情绪宣泄替代学术争鸣的反专业化倾向，或将专业标准身份化、将参与资格垄断化的专业封闭主义倾向。

创造知识生产与传播新生态。大众学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具有一系列潜在价值。一是大大拓展知识生产的经验与资料来源，激活了散布于社会生活中的知识资源，使大众经验有机会进入知识生产过程，成为专业研究的有益补充。二是强化知识实践的现实导向，促进研究问题与社会需求的连接，知识生产被要求合理回应公众需求和社会变化。三是为跨主体的协同创新提供条件，专家学者、一般研究者以及行业实践者联合起来，通过出版社、期刊报纸、各类互联网平台，经由持续协作、相互校正，推动知识的创新发展。四是促进知识的开放共享与公共普惠，知识成果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被大众获取、理解和运用。

那么，如何以大众学术为锚点，发挥其联系社会实践、汇聚多元主体的优势，牵引专业学术机构、互联网平台和媒体调整规则，形成协同共创、开放共享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新生态呢？

一是鼓励多元参与，推动知识互动向协同共创机制转化。当前的大众学术实践，多依赖个别创作者、专家和媒体的推动，容易随热点消退而中断，并且不少问题很快从理性讨论、平等交流蜕变为情绪对抗和立场对立，无法积累可信的公共知识。未来，可以围绕具有公共意义的具体问题，探索构建专业研究者、行业实践者、知识类创作者甚至普通公众协同共创的生产流程，充分发挥各主体优势，把原本松散、短暂甚至相互对立的知识互动，转化为能够持续生产公共知识的协作关系。

二是规范知识生产，将多元参与转化为可信知识。大众学术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现象，如材料来源不清、证据使用片面、立场先于说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未经核验等。对此，可确立一套对各类参与者一体适用的知识规范。根据知识领域实行分类治理，对医疗、法律等特殊领域提高专业核验要求，对一般知识分享和探索性讨论保留必要空间。同时，引导媒体、平台和专业机构提供有力支撑，鼓励主流媒体主动积极引领学术争鸣，构建支持大众学术发展的平台体系，专业机构参与相关环节，以保证大众学术的发展质量。

三是以平台规则优化承接优质实践，为大众学术长远发展提供支撑。平台不仅提供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技术条件，也通过推荐、激励、协作、纠错、保存和权益配置等规则，塑造大众学术的目标与主体关系。平台的规则优化应从流量管理转向知识生态治理，形成多样立体的知识生产评价体系，鼓励优质内容的生产、传播与保存，打造促进各方交流讨论的生态空间，促成多元参与、形成持续协作、完善纠错机制。同时，加快打造专业学术机构、媒体、平台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知识治理格局。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

治理之道

大众学术打破表达边界也需守住学术规范

观而思

□ 吴志远

近现代以来，现代大学、科研机构和学科制度逐步建立，学术研究日益专业化、制度化。专业分工推动了知识的积累与创新，也使学术表达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方式和传播渠道。与此同时，报刊、广播电视与互联网的发展，不断推动学术知识从专业共同体进入公共生活。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同样体现了这一趋势。新式教育、报刊出版以及新文化运动推动科学知识和现代思想的传播，拓宽了民众获取知识、参与公共讨论的渠道，促进了思想启蒙、社会观念更新和现代化探索。学术知识走向大众，始终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紧密相连。

今天，数字平台进一步改变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条件。专业研究者通过短视频、直播、播客等形式向公众解释专业问题，行业从业者和普通公众也凭借知识积累、实践经验等参与知识交流。大众学术由此成为数字时代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这一变化也提出了一个现实课题：在打破传统学术表达边界的同时，如何保持知识生产应有的专业性、严谨性和系统性？

打破学术表达的边界，首先要拓展知识交流的主体和空间。传统学术研究依托专业训练、学科分工和同行评价，形成相对稳定的知识生产秩序。这些制度安排为学术质量提供了保障，但专业术语和学术发表传播渠道也可能拉大研究成果与公众生活之间的距离。大众学术为研究成果进入公共生活创造了条件。研究者可以用通俗而准确的方式解释研究发现；具有专业技能和长期实践经验的其他社会成员，可以为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线索；公众在知识交流中提出的问题，也能够成为学者发现新议题的重要来源。专业研究与社会经验由此展开双向交流。

学术研究并不是空中楼阁，它源自现实，亦要回归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学术研究的开放有助于增强问题意识。事实上，普通人的经验和疑问能够帮助研究者重新审视已有的学术解释。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认为，社会成员通过沟通形成共同的理解，交流者也会在理解他人经验的过程中改变自身认识。大众学术的积极意义，正在于使专业知识与公众经验展开更充分的交流。不过，在参与和讨论过程中，公众提供的经验需要进一步核实、比较和分析，经过系统研究，才能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价值的知识。

但是，打破表达形式的限制，必须守住知识生产的基本规范。学术知识之所以值得信赖，在于它以事实材料为基础，依靠研究方法和逻辑论证形成结论。知识主张不仅应当接受共同标准的检验，也应允许被质疑和修正。无论知识以论文、视频还是直播的形式呈现，都应当准确陈述事实、说明证据来源、区分已有共识与不同意见，这是基本要求。通俗表达可以减少专业术语，却不能舍弃必要的论证；传播形式可以更加生动，却不能为了吸引关注而夸大结论。尤其是对复杂的历史、社会和科学问题，片面截取材料或将个别事例上升为普遍规律，都可能误导公众。

当前，平台传播机制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够辅助文献检索、资料整理、概念解释和形式丰富的表达，降低公众接触专业知识的门槛，也为研究者转化学术成果、跨学科获取信息提供便利。过去受限于专业语言和知识获取能力的普通读者，如今可以借助智能工具更快进入相对专业的知识领域。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包含虚构文献、错误事实或缺乏根据的推断；平台对点击量和互动数据的追逐，也容易使复杂知识被压缩成更吸引眼球的标题标签和简单结论。工具使用越便利，对知识来源的核查和对研究结论的审慎判断就越不能放松。

另外，还应把握好学术研究与大众知识普及的关系。知识普及侧重对已有成果的准确介绍与解释，学术研究则要在系统掌握文献、规范使用方法和充分分析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新认识。二者可以相互促进，但不能以内容传播的热度证明学术创新，更不能把人工智能整理的信息直接当作经过验证的研究成果。大众学术发展应注重提升公众的知识理解能力，同时尊重专业研究形成知识的基本过程，避免碎片化表达削弱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推动大众学术健康发展，需要形成知识生产、平台传播与社会评价之间的良性关系。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应鼓励研究者主动参与公共知识传播，支持专业团队与知识创作者合作，加强学术成果的通俗化转化，并从公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中获得研究启发。知识创作者应坚持事实核查、资料溯源与准确引用，对存在争议的观点作出必要说明，对发现的错误及时更正。数字平台应完善知识内容的推荐与评价机制，减少单纯以短期流量衡量内容价值的倾向，把原创性、准确性、专业依据和长期社会效益纳入评价，形成有利于优质知识持续生产的环境。

大众学术的发展拓展了知识传播的公共空间，也为学术研究注入了来自社会生活的新活力。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既应发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知识交流，也需坚持学术规范，尊重知识生产规律，促进知识普及与专业研究有序衔接，让更多人接触知识、理解知识，并在可靠的知识基础上认识现实、参与公共生活，真正发挥大众学术的社会价值。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大众学术发展中需要正视的突出问题

□ 宋春艳

大众学术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是技术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使大众具备了参与知识生产的能力与需求；个人兴趣引发的深入思考、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规律性总结与发现，又为其积蓄了内生动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则进一步降低了参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门槛，是重要的外部助力；传统学术一度存在精英化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对急迫现实问题的回应有所滞后；等等。当前，传统学术的围墙正在被推倒，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心正加速向网络空间迁移，论坛版主、公众号与视频号创作者乃至评论区深度跟帖者，都已成为知识生产的多元主体。然而，去建制化、平台化、流量化的特征，也使大众学术发展出现了一些应该加以规范的问题。

生产端需强化内容把关。大众学术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学术水平难免参差不齐，在同行评议、职业编辑把关等传统质量保障机制覆盖不足的情况下，“谁来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课题。比如，个别创作者在缺乏系统学科训练的情况下，却以“专家”人设输出超过自身认知边界的内容，这一现象有待规范。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伪科普、伪历史内容并非一眼可辨的粗制滥造，而呈现出话术专业、包装精致、部分真实却导向谬误的混合形态——援引真实概念、使用学术化表达，却得出经不起推敲的结论。其“伪”不在于内容全然为假，而在于以学术的外观回避了学术的规范约束：不标注来源、不区分观点与证据、不披露人工智能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使洗稿更为容易，“AI幻觉”与编造数据之间的边界日趋模糊。但无论边界多模糊，“是否可溯源、是否披露”这一规范的标准仍需清晰。

中介端需避免流量逻辑取代知识逻辑。算法是大众学术生态的主导中介，其底层优化目标是用户停留时长与互动频次，知识的准确性与公共价值居于次要位置。这一取向带来的影响，比以往“标题党”现象更值得关注。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哪些知识内容容易被看到、哪些容易被埋没存在着流量偏向，即严谨但“不刺激”的内容在流量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而吸睛标题、对立叙事、情绪煽动更容易得到传播。算法精准投喂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信息茧房效应，公众接触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学术观点的机会受到压缩。若不加以干预，看似众声喧哗、实则理性讨论所需的信息多样性基础就会存在流失风险。当知识价值的评判权遵循流量逻辑，大众学术“让专业知识在争鸣中走向理性共识”的潜能便难以充分激发。

接受端应侧重认知赋能，重在启发式参考。大众学术的受众一般分为两类：将大众学术内容作为开拓思路的参考，受众仍保有独立判断，这是启发式参考；将输出直接视为权威结论不再求证，这容易陷入认知依赖。当前的风险在于，诸如一键转发、点赞反馈、沉浸式体验、算法反复投喂这类平台交互设计，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从启发式参考走向认知依赖的心理门槛，受众对所接收到的知识进行求证的耐心与能力可能会弱化，从而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认知依赖。具体来说，随着知识分工高度专业化，专业门槛远超个体经验范围，大众对不熟悉领域的知识获取和求证，会更多依赖“看起来可信”的博主和平台。

治理端应加强权责适配。大众学术的生态结构是“算法设计者—平台运营商—知识创作者—受众”的多边关系。现行治理虽已将平台纳入责任主体，算法推荐、内容生态治理、人工智能标识等新规相继出台，但规则较为原则化、碎片化，监管方式偏重事后处置，责任配置与实际权力结构仍不够匹配：占据技术、流量与收益优势的平台和知识创作者虽有监管要求，但追责难以落地、违规成本偏低；处于信息链末端的受众反被要求提高辨别能力，形成一定程度的权责不对称。因此，应优化责任配置，确立谁掌握知识被看见的控制权、谁就承担知识质量的把关责任的原则，平台控制算法分发，应在可见性层面担责；知识创作者控制内容生产，应承担披露与溯源责任。同时，对大众学术这一公共知识空间必须引领其向公共利益方向发展。

总的来看，面对大众学术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应当包容发展、审慎规范。唯有以规范立信、以责任固本，让大众学术这股清泉真正汇入建设文化强国、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洪流，方能为民族复兴的知识根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深度观察